



古风杂记

□刘广荣

古代精彩纷呈的冰雪运动

冰雪运动,除了暖身,还可以健体,因此古人对其颇为热衷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云: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”诗中“如履薄冰”的意思是好像踩在薄薄的冰上。在古人看来,冰上行走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运动——小心翼翼地在脆弱的冰面行走,不仅需要凝神静气,更考验身体的协调与平衡,稍有不慎便有随时掉入水中的危险。这种与冰雪的互动虽带着风险,却也是古人锻炼身心的一种方式。

“骑木而行”“乘木逐鹿”“乘木马”是古人原始的冰雪运动。唐代魏徵在《隋书·列传》中提到:“南室

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,分为九部落……气候最寒,雪深没马……地多积雪,惧陷坑阱,骑木而行。”当时天气十分寒冷,雪特别厚,马容易被雪埋不能动弹;人害怕陷于积雪之中,所以骑木滑行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说:“人皆著木脚,冰上逐鹿,以耕种射猎为业。”北方部落的人喜欢打猎,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耕种收获少的时候,他们就穿木质鞋,在冰上追野鹿。

“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、弥列、哥饿食,其酋长皆为颉斤。桦皮覆室,多善马。俗乘木马驰冰上,以板藉足,屈木支腋,蹴辄百步,势迅激。”宋代欧阳修、宋祁等编撰的《新唐书·回鹘列传》中说到,木马突厥三部落的人善于骑马,有在冰雪上乘木马的习俗。此木马由踏板和弯曲的木条做成,踏板支起弯曲的木条。人乘木马时,把脚系在踏板上,把弯曲的木条支在腋下,用力一滑,动辄溜出百步,速度快且有力。这“木马”与今天的滑雪板十分相似。

“凌床”“拖床”冰雪运动很有趣,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:“信安、沧、景之间……冬月作小坐床,冰上拽之,谓之‘凌床’。”那是在冬天制作的一种小型坐床,由几个人用绳子拉着在冰雪上行走。明代吕毖的《明宫史》中载:“冬至河冻,可拖床。以木作平板,上加交床或稿荐,一人在前引绳,可拉三二人,行冰如飞。遇积雪残云,景更如

画。”冬天,残云与积雪辉映,风景如画,一人拉,两三人坐,在冰雪上,“拖床”好像飞一样快。

“溜冰”也是古人喜爱的冰雪运动之一。清代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写道:“冰上滑擦者,所著之履皆有铁齿,流行冰上,如星驰电掣,争先夺标取胜,名曰溜冰。都人于各城外护城河下,群聚滑擦,往还亦以拖床代。”溜冰比赛,参与之人众多,“冰鞋以铁为之,中有单条缚于鞋上,身起则行,不能暂止。技之巧者,如蜻蜓点水,紫燕穿波,殊可观也”(清·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)。当时溜冰不乏佼佼者,他们能做“蜻蜓点水”“紫燕穿波”等高难度动作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足球冰雪运动亦是古人竞技体育的特色项目之一。清代吴振棫在《养吉斋从录》中说:“岁十二月,西苑三海层冰坚泊,于是择令辰,圣驾御冰床临视焉。或五龙亭,或瀛台寺,或瀛台等处,无定地。冰鞋以一铁直条嵌鞋底中,作势一奔,迅如飞羽。”继曰“抢球”,兵分左右队,左衣红,右即衣黄。既成列,御前侍卫以一皮球猛踢之至中队,众兵争抢。”每年十二月,西苑(今北京北海公园附近)水域都结厚厚的冰,组织者选择一个良辰吉日,皇帝坐冰床大驾光临来观看足球冰雪运动。参加运动的士兵穿冰鞋上场,分为红黄两队,随着“抢球”一声令下,御前侍卫发球,比赛正式开始……“每队

数十人,各有统领,分位而立,以革为球,掷于空中,俟其将坠,群起而争之,以得者为胜。或此队之人将得,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。欢腾驰逐,以便捷勇敢为能。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把参加比赛的人数、领队、踢什么球等作了介绍。

清代李声振《百戏竹枝词》云:“蹴鞠场中浪荡争,一时捷足趁坚冰。铁球多似皮球踢,何不金丸逐九陵。”其中的“蹴鞠”就是踢足球。

冰雪上的射箭更引人注目。“走队时,按八旗之色,以一人执小旗前导,二人执弓矢随于后。凡执旗者一二人,执弓矢者倍之,盘旋曲折行冰上,远望之蜿蜒如龙。将近御座处设旌门,上悬一球,曰‘天球’,下置一球,曰‘地球’。转龙之队疾趋至,一射天球,一射地球,中者得赏。复折而出,由原路盘曲而归其队。其最后执旗者一幼童,若以为龙尾也。”出自《养吉斋从录》。当时参加冰雪上射箭的人非常多,如果举旗的有一百人,那么射箭的人就有两百人。从远处看,参加比赛的队伍弯曲,就像一条条长龙。比赛时,在御座附近设旌门,上面悬挂一只球,叫“天球”,下面也悬挂一只球,称“地球”。参加射箭的人要快速赶到指定位置进行射击,凡是击中“天球”“地球”之人就能获得奖励。

古人在冰雪之中开拓出了一片生动而多彩的运动天地。

国学小知识

“五湖四海”指什么?

“五湖四海”作为一个成语使用,起码有一千多年了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五七吕岩《绝句》云:“斗笠为帆船作舟,五湖四海任遨游。”宋人李洪《谒皇甫清虚》诗云:“五湖四海仰仪形,道貌天真孰可名。”

而在更早之时,“五湖”与“四海”是分开使用的。“五湖”所指,典籍中的说法不一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及扬州,有“其川三江,其浸五湖”之语,不少注释都称“五湖”不是五个湖,而是指太湖。当然,实指为五个湖的更多见。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九《沔水》,以太湖及附近四湖为五湖,即长荡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、滆湖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沉孙武于五湖兮”句下,李贤注引虞翻之说,认为五湖是指滆湖、洮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。还有一种说法,就是“五湖”不只一湖,也不在一地,是指太湖、鄱阳湖、青草湖、洞庭湖、滆湖。

“四海”的说法起源也很早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说:“文命敷于四海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中说:“夫孝,置之而塞乎天地,溥之而横乎四海,施诸后世而无朝夕,推而放诸东海而准,推而放诸南海而准,推而放诸北海而准。”古人认为中国处于天下正中间,四周都有海,所以周边称四海,分别是东海、南海、南海、北海,外国就是海外了。

五湖、四海的范围都很广,合在一起就可泛指全国了,有时甚至泛指全世界。

说文解字

□侯杰

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,很多人习惯将其中的“为”字读作四声,理解成“为了”,认为“人如果不为自己谋私利,就会被天地诛灭”。其实,这是一场流传甚广的误读,它的真面目读作二声,是“修为”“修养”的意思。

在儒家语境中,“为己”是君子立身的核心。《论语》有言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朱熹注:“为己,欲得之于己也;为人,欲见知于人也。”意思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身修养,完善品德;而现在有的学习却是为了做给别人看,博取虚名。这种“为己之学”,正是“人不为己”中“为己”的源头。一个人若不注重自身修养,放任内心的私欲膨胀,言行背离道德准则,便是背离了“天道”,最终被众人唾弃。

道家思想中,“为己”则指向顺应自然的自我修行。《道德经》强调“修之于身,其德乃真”,主张人要向内求索,修养自身的德行,才能契合自然规律。若不修己身,任由欲望挟持本心,就会打破内心的平衡,也会破坏人与自然、人与他人的和谐,这便是对“天道”的违背。

生活中,很多人曲解了“为”的含义,将“修己”的劝诫扭曲成“利己”的宣言。于是,这句本是劝人向善的古训,反倒成了某些人追逐私利的“遮羞布”。

其实,放眼历史,那些被后世铭记的贤者,无一不是“为己”的践行者。孔子周游列国,颠沛流离,却始终坚守“克己复礼”的信念,这是修己;王阳明龙场悟道,在绝境中砥砺心性,提出“致良知”的主张,这也是修己。他们的“为己”,不是为了一己之私,而是通过完善自身,进而影响他人,造福社会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言:“修身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修己,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,而是兼济天下的起点。

在当下社会,真正的“为己”,是修养品德、坚守良知,是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。当每个人都能以修身而己任,约束私欲、涵养德行,人与人之间便会少一分算计,多一分真诚;社会也会少一分浮躁,多一分温润。

人不为己,是为了自己吗



《冰嬉图》局部

古韵吟咏

□阳锡洲

诗词情怀万代长

文化传承中,先辈们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愁与家国之思写入诗行,留下无数动人诗章。

古代游子远行,音信阻隔,有“感怀心如捣”的日夜焦灼;遥思亲人,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远行人”,更有“惨惨柴门风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”的锥心自责,企盼与牵挂都在思念翻转中说尽;捎信还乡,又生百般踌躇,“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发又开封”;纵使风尘仆仆归来,“低回愧人子,不敢叹风尘”。待到阅尽天涯,方悟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中蕴含的生命重量。

待到为人父母,始知“临行密密缝”的针脚里,藏着“爱子心无尽”的慈颜;在“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”的端详中,才懂得“当时父母念,今日尔应知”的代际轮回。在勉励子女“力学如力耕,勤惰尔自知”的同时,若能“父子灯前共读书”,便能感受到更多人世间的温暖与慰藉。

至于友情,是白居易“君埋泉下泥销骨,我寄人间雪满头”的生死契阔,是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岁月悬隔,是李白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的率真别意,是高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慰勉,亦是王昌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交心自白。而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的折梅遥赠,“柳条折尽花飞尽,借问行人归不归”的

恩。最动人莫过于苏轼“与君世为兄弟,再结来生未了因”的血脉之约,竟可超越生死盟誓。

爱情在诗词中一向都能绽放斑斓色彩。从“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”的直白倾诉,到“玲珑骰子安红豆,人骨相思知不知”的巧思隐喻,爱情滋味万般重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”是灵魂的默契;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是重逢的期许。金昌绪《春怨》里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”,是思妇对征人婉转的嗔怪;杜甫“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”,则写尽乱离中夫妻的悬念。至于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与“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疑”,便是对长久相伴最朴素的期许与践行。

至于友情,是白居易“君埋泉下泥销骨,我寄人间雪满头”的生死契阔,是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岁月悬隔,是李白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的率真别意,是高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慰勉,亦是王昌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交心自白。而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的折梅遥赠,“柳条折尽花飞尽,借问行人归不归”的

恩。最动人莫过于苏轼“与君世为兄弟,再结来生未了因”的血脉之约,竟可超越生死盟誓。

倚门怅望,皆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温情范式。

乡愁最是深藏难说破。崔颢“日暮乡关何处是?是苍茫一问,王维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是含蓄一探,杜甫“月是故乡明”是执拗一念,叶绍翁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”是触景一叹,唐寅“多少天涯未归客,尽借篱落看秋风”是远望一怅。及至归乡,竟成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的欲语还休。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余韵悠长。

家国情怀是诗词中最铿锵的声部。王昌龄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写尽边关将士的决绝,陆游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道出文人志士的孤忠,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更是民族危亡之际的壮怀激烈。文天祥兵败被俘,过零丁洋时沉郁顿挫,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其声穿云裂石,其志光耀千古。

诗词情怀万代长,这是个体生命的深情吟咏,也是民族精神的不朽载体,更是炎黄子孙绵延千载的情感共同体。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”,至今读来,我们仍能汲取慰藉与前行的力量。

文渊听泉

□钱俊男

古人也讲“普通话”

推广普通话,可以打破方言隔阂,促进全国各族人民顺畅交流,增进民族团结,为经济发展、文化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提供坚实基础,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。那么在没有现代普通话的古代,天南地北的人们是如何沟通的呢?

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沟通需要共同语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: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《书》《执礼》,皆雅言也。”这意味着,来自鲁国的孔子在日常交谈中可能使用方言,但在诵读经典和主持典礼时,则采用当时的标准语——雅言。“雅言”的“雅”字意为“正”,即正确、规范的语言。雅言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,其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。西周时期,雅言以王畿所在的镐京(今西安)一带的方言为基础;东周迁都洛邑(今洛阳)后,雅言的标准音逐渐向洛阳音倾斜。雅言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,成为联系各诸侯国的重要文化纽带。无论是位处西北的戎人首领,还是身处山东的孔子,他们在外交场合与学术交流中,都使用这种当时的“普通话”。

“官话”这一称谓到明代才正式出现。顾名思义,官话最初是指官吏在官场上通行的话。明代初期,明太祖朱元璋颁布《洪武正韵》,以中原雅音为正音,

并将南京官话定为全国通用语。后来朱棣迁都北京,带去了大量南京人,南京官话在北京落地生根,影响了当地语言。清朝早期,南京官话仍为官方主流标准语。但随着满族人主北京,满语与北京当地的汉语方言融合,逐渐形成了新的北京官话。雍正年间,清政府设立正音馆,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。雍正皇帝要求官员掌握“人人共晓之语言”,并规定“举人生员监生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全国推广官话。

尽管古代有共同语,但其使用范围主要局限于官吏、士大夫和行商之间。普通百姓大多安土重迁,流动性小,缺乏使用共同语的客观需求。同时,在清朝雍正年之前,朝廷并未大力向全民推广共同语,因此各地方言差异依然显著,甚至朝廷之上也常因语言不通而需要翻译。《朝鮮实录》记载,明清时期,朝鮮使臣来华,需要学习中国的官话;而清初的朝鮮皇帝听不太懂福建、广东官员的方言,允许在召见时配备“翻译”。对土人而言,

掌握共同语却是进入仕途的关键。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,再到入仕为官,共同语贯穿始终。学校采用共同语授课,科举考试要求考生使用官方规范的读书音,而官员在发布政令、汇报工作时也必须使用共同语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普通话”概念,最早由清末“切音字运动”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。他在1906年出版的《江苏新字母》中注明:普通话是“各省通用之话”。1911年,清政府学部通过《统一国语办法案》,正式将“国语”定为官方语言,并以北京音为标准。1955年,新中国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,将“国语”改为“普通话”,并确定了其科学定义: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。”不过有趣的是,今天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地并非北京,而是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。承德方言在谱系上属于北京官话,字正腔圆,音准分明,与普通话极为接近。